

# 北京志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

# 出版志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 /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 - 200 - 06221 - 9

. 北... . 北... . 北京市—地方志 出版工作—概况—北京市 .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297 号

责任编辑	于虹 吴坤定
版式设计	程澈
总体装帧设计	王晖 张延宁
本书美术设计	张中华 隋毅
责任印制	赵恒

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

BEIJINGZHI·XINWEN CHUBAN GUANGBO DIANSHI JUAN·CHUBANZHI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 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霸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54.125印张 彩插32页 991千字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400

ISBN 7 - 200 - 06221 - 9/ K·674

定价:190.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 - 58572393

# 《北京志·出版志》编辑说明

一、《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第一编纂委员会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和有关单位组成，负责《报业·通讯社志》、《期刊志》、《出版志》的编纂工作；第二编纂委员会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有关单位组成，负责《广播电视志》的编纂工作。

二、《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以下简称《出版志》）内容主要记载北京地区（包括北京市和中央各个系统）的图书出版事物。关于报刊的出版，本志不涉及。

三、本志记述内容，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3年。个别事例，为表述完整，下限在时限上偶有突破之处。各出版单位名称以1993年底的称谓为准。

四、本志不设人物传记，仅设出版界有关领导人名录，其任期年限，不受本志下限的限定。

五、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单位名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六、日伪统治时期的政权机构，前面加“伪”字。

七、为叙述方便，有的章节把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9月30日）的图书出版工作，与新中国建立后的出版工作，放到同一节记载；个别的则放到中华民国时期记载。

八、清以前（含清）的书肆和刻坊常常兼营。前店售书，类似当代的书店，后厂编书、刻版、校对、印刷，类似当代的出版社或印刷厂，但店名是一个。故在本志《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两章中，有时稍有重复之处，为了便于查阅有关行业的资料，采取了两处均予保留的方案。

九、清以前官方对图书的编辑、审查、出版和管理等，多为一身兼任数种职责，分工不如当代细致，故同一机构在《出版志》的不同章节中，往往多次出现，难以避免。有时是出版单位，有时是管理机构，为保存历史原貌，故不避重复，均依实照录。

十、辽代之国号，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称契丹或辽。为叙述方便，统称为辽代。有年号又必须称国号者，按实际情况，分别称契丹或辽。

十一、据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称：“用‘多’‘余’‘左右’‘上下’‘约’等表示的约数一般用汉字。如果文中出现一组具有统计和比较意义的数字，其中既有精确数字，也有用‘多’‘余’等表示的约数时，为保持局部体例上的一致，其约数也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本志在书写数字时，即遵循此规定。

## 《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第一编纂委员会

主任 薛凡 (1992年3月—1993年5月)  
龙新民 (1993年5月—1995年1月)  
何卓新 (1995年1月—1998年1月)  
吕浩才 (1998年1月—1999年3月)  
薛宝书 (1999年3月—2003年3月)  
孙向东 (2003年3月— )

常务副主任 孙忠铨 (1992年3月— )

副主任 王相 (1992年3月—1998年12月)  
满运来 (1998年12月—2001年5月)  
徐文珍 (2002年5月— )  
郑潜 (1992年3月—1994年7月)  
李世凯 (1994年8月—1996年7月)  
徐惠国 (1996年8月—2000年7月)  
曲仲 (2000年8月—2001年12月)  
龙杰 (2002年1月—2002年12月)  
李清霞 (2003年1月—2003年12月)  
乔玢 (2004年1月— )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正 王德泉 石峰 白树联 许守琴

陈瑞美 李慰怡 张伯华 底 铭 钟 岩  
陶一凡 程曼珍

办公室主任 许守琴

## 《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编写组

主 编 田 耕 (1992年3月— )

副主编 孙忠铨 (2001年1月— )

滕振才 (2001年1月— )

苑省民 (2002年1月— )

编写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 耕 左景元 孙忠铨 许守琴

何 玲 张 放 杨维新 武凤兰

苑省民 底 铭 滕振才

统稿者 田 耕 滕振才 苑省民

图 片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进 田 耕 孙忠铨 苑省民

滕振才

## 本志编写组顾问

郑 潜 (1992年3月—1994年7月)  
朱述新 (1993年4月—2002年4月)  
陶信成 (1993年5月— )  
吴雨初 (2002年4月— )  
钟制宪 (2002年12月— )

## 北京出版社史志办公室

主 任 滕振才 (1992年7月—2000年12月)  
边海滨 (2001年1月—2001年12月)  
于 虹 (2002年1月— )

常务副主任 于世斌 (1992年7月—1992年12月)

主 审 段柄仁  
副主审 赵庚奇 田 耕  
责任审稿 赵 伸

# 目 录

概 述 ..... ( 1 )

## 第一篇 出 版

第一章 出版方式 ..... (39)

    第一节 手工制作的图书 ..... (40)

    第二节 印刷出版物 ..... (51)

    第三节 音像与电子出版物 ..... (74)

第二章 出版单位 ..... (80)

    第一节 清以前的出版单位 ..... (85)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出版单位 ..... (106)

    第三节 新中国的出版单位 ..... (145)

## 第二篇 图 书

第三章 图书要览 ..... (231)

    第一节 哲学社会科学图书 ..... (245)

    第二节 自然科学图书 ..... (315)

    第三节 综合类图书 ..... (348)

    获重奖图书名录 ..... (369)

第四章 编辑工作 ..... (378)

    第一节 文字编辑 ..... (381)

第二节	装帧设计.....	(403)
第三节	校对工作.....	(415)
第四节	编辑人员.....	(423)
第五节	编辑学研究.....	(434)

## 第三篇 流 通

第五章	发行单位.....	(439)
第一节	清以前的书肆.....	(440)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书店.....	(454)
第三节	新中国图书发行单位.....	(482)
第六章	发行工作.....	(535)
第一节	销售 服务.....	(540)
第二节	宣传推广.....	(551)
第三节	进货 发货 储运.....	(554)
第四节	发行人员.....	(561)

## 第四篇 管 理

第七章	出版管理.....	(571)
第一节	管理机构.....	(573)
第二节	出版法规.....	(583)
第三节	行业管理.....	(598)
第四节	出版社内部管理.....	(659)
第五节	教育培训.....	(672)
第八章	版权管理.....	(680)
第一节	机构设置.....	(681)
第二节	版权法规.....	(689)
第三节	著作权保护.....	(700)
第九章	名录.....	(735)
参考资料目录	.....	(803)
索引	.....	(807)
编后	.....	(839)

# 概 述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项和出版业有关：一为造纸，二为印刷。

北京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和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关联。

北京自商末周初以来，多次成为方国或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商末古燕国的土城遗迹，就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西周初年（前1045年），武王封尧之后于蓟，蓟在北京；封召公于燕，燕灭蓟后，迁都于蓟。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燕国慕容皝称帝，定都于蓟。916年，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国号契丹（后又改国号为辽），建元神册；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将燕云（包括幽蓟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太宗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建为陪都，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金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金灭辽后，建都于北京，定名中都。蒙古人灭金后，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建国，国号曰元，立都于北京，名大都。明灭元后，开始定都于南京，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迁都北京，是第一个把汉族皇朝立都于北京的人。满族人灭明，定国号为清，立都北京。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首都在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定都于北京。

处于以上环境中的北京图书出版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以图书为媒介促进民族融合；三、通过图书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四、皇家支持出版的大型图书多；五、冲破禁锢传播进步文化；六、几度成为

---

关于周武王封召公于燕的年代，学术界有“前1042年”、“前1045年”、“前1046年”等诸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主张后者，目前尚未统一。

关于辽（契丹）之国号，曾数次变更：一、916年至946年，国号为契丹；二、947年（一说938年）至982年，改国号为辽；三、983年至1065年，复改国号为契丹；四、1066年至1125年复改国号为辽。见张习孔、田珏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三卷。

北方或全国的出版中心；七、改革开放中的北京出版业发展迅猛。



北京地区图书出版源远流长 北京原始图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公元前 11 世纪），其标志性的代表物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 M251 号墓出土的伯矩鬲和 M253 号墓出土的董鼎，均带有相同的 26 字铭文；另外，在 1193 号西周大型墓出土的太保 和太保 ，都带有内容相同的 43 字铭文。以上四件青铜器铭文中，分别铸有“太保”和“（燕）侯”字样，从而证实了西周初年，周武王册封召公（太保）为燕侯的史实。另外，在昌平等地先后出土了西周时期的三批甲骨文。甲骨文和钟鼎文均是原始型的图书，一般字数较少，只有在北京地区发现的西周成王时代的重要青铜器“班簋”，上有铭文一百九十余字。

据《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记载，北京地区最早的图书，为周代的《燕春秋》和《燕十事》，但此二书已佚。流传至今的北京最早的图书，为战国晚期或汉初期的《燕丹子》，系燕太子丹宾客所记。

现存有实物可证的和燕国有关的最早的古籍，是 1973 年 12 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这批帛书保存了许多被埋没了两千多年的真实可靠的苏秦史料，在 27 章帛书中，有关苏秦的史料多达 16 章，除了第 20 章到 22 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外，其它都是不曾见过的新资料。苏秦自齐、赵、韩、梁（即魏）各国写给燕昭王和齐闵（一作 ）王的信件与说词，讲的都是和燕国利害攸关的问题，史料价值极大，对研究《史记》和《战国策》，能起到纠谬补阙的作用，对研究燕国史和北京史，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古籍。

北京地区已知最早的手抄纸书，出现于南北朝以后北魏天赐元年（404 年）后，有蓟人平桓所写的《略注》百余篇，久居蓟城的梁柞所写的《魏国统》二十卷，渔阳雍奴人高闾所写的《燕志》十卷等。但有实证的北京最早的手写纸书，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在幽州抄写的《诸经要集卷十二至二十》，

---

见 1980 年北京史研究会编印的《北京史论文集》第 67 页，张宁撰写的《从马王堆帛书看纵横家苏秦》。参阅《文物》1975 年第 2 期第 26 页，杨宽《马王堆帛书 战国策 的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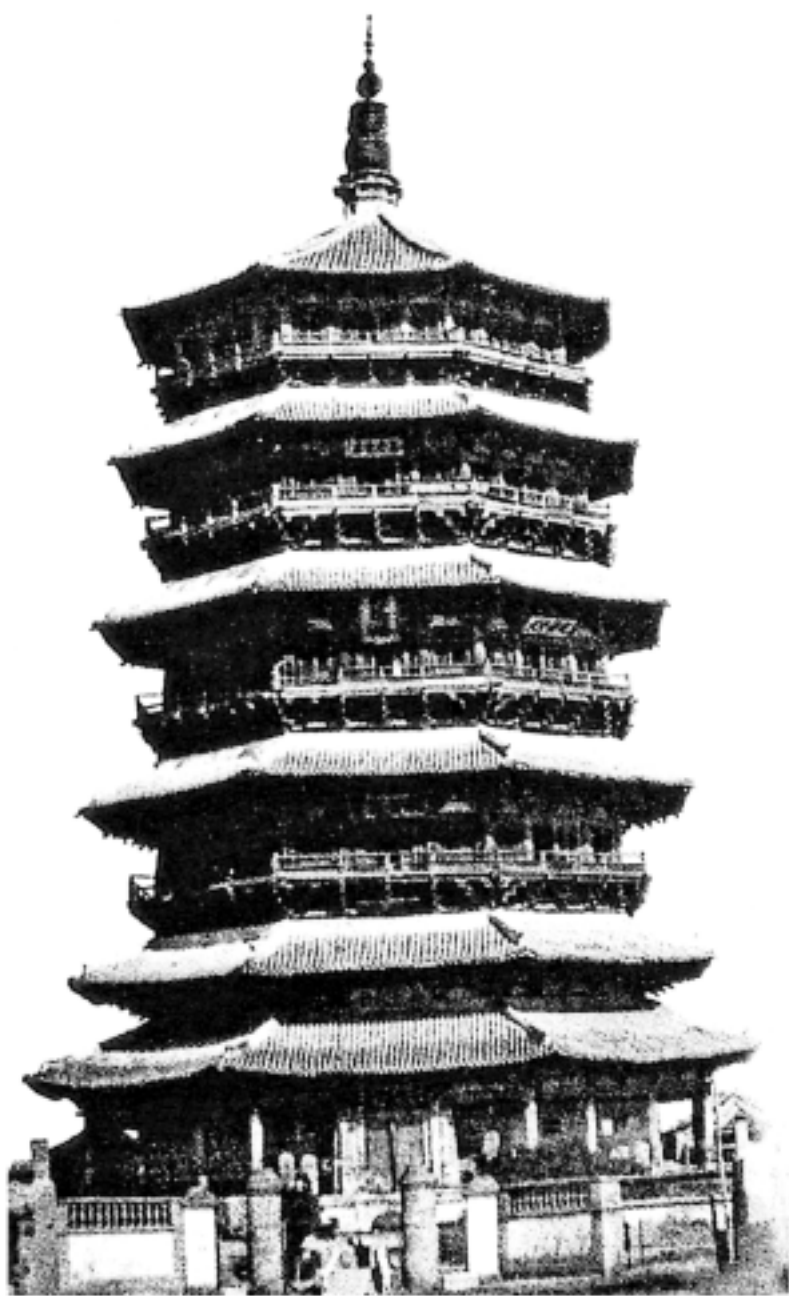
梁，即魏，战国七雄之一。魏惠王于公元前 362 年徙都大梁，故称梁。见《辞源》第 1575 页。

此书原件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伯希和编号 2163），现存法国巴黎。

北京现存的比《诸经要集卷十二至二十》出现更早的图书，是隋代幽州僧静琬法师于房山开始刊刻的《云居寺石经》。其师北齐南岳法师慧思，鉴于北周武帝灭佛焚经，遂发愿刻经于石，以防法灭。静琬自隋大业年间（605—618年）开始刻经，之后，其历代僧徒刻经不止，由隋，历经唐、辽、金、元直到明代，前后绵延一千余年，所刻石经逾万块（现存 14 277 块）。其中，《称赞净主佛摄受经》一卷，系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所译，是现存最古一种版本。

北京地区的雕版印刷，有实物可证的是契丹统和八年（990年）燕京仰山寺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此书是在 1974 年维修山西应县辽代木塔时发现的。在该塔发现的大量经卷，纸张多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光泽润滑，可以防蛀，至今已历千载而未蠹，由此可见当时燕京造纸技术之高超。在该塔同时发现的还有 6 幅彩图，其中《释迦牟尼像》采用套色丝漏印刷，使用红、黄、蓝数色，至今鲜艳夺目，据考证，也是燕京作品。

北京的书肆业约出现在唐代，但有文字可考者，则在五代初。据《契丹国志》卷十四《东丹王传》记载，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性好读书，仰慕华风，曾“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由能发行图书达“数万卷”之多的记载，可看出当时幽州的书肆业已非常发达。之后，到了会同元年（938年），契丹将幽州改为南京，变为陪都，开泰元年（1012年）又改名为燕京。燕京的许多书肆都是前店后厂，既是刻印



应县辽代木塔

图书的作坊，又是发行图书的书店。他们大量刻印佛教经藏、儒家经典和宋代苏轼兄弟所写的诗词，特别是他们给皇帝上奏的章疏、士子的策论，由于内容是讲“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的，所以此等文字传到燕京刻印后，十分畅销，利市十倍，宋辽双方均屡禁不止，大大促进了书肆业的发展。

关于销售图书的广告，最早是在应县辽代木塔发现的经卷里的一张目录，名为《燕台大悯忠寺新雕诸杂赞一策》，上面共列诸杂赞十八目，是目前已知的北京最早的书籍目录和发行广告。另外，在明嘉靖元年（1522年），北京金台书铺汪谅，把所刻的14种书名，列在《文选》后面，以便读者选购。并印有：“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字样。

关于书铺的商标，最早是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北京出现的。北京《全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三册，每册后面均有一行文字：“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刊行，麒麟为记。”这可以说是现代商业上商标的萌芽了。

关于图书索引，中国古书多无索引，西文书则有索引，以便读者检索。中文书最早有索引者，目前已知的当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北京出版的葡萄牙人阳玛诺翻译的《圣经直解》八卷。但当时无人仿效。直到近现代图书出版物出现后，才有索引。

关于图书出版和发行管理的法令，在辽代就已出现。如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于契丹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写成一部关于音韵文字学的著作，名为《龙龕手镜》，是一部汉字字书，类似现在的字典，深受文学家的重视。宋神宗年间（1068—1085年），有人自辽购得此书，后又在浙西刻印。因避宋讳，改名《龙龕手鉴》。当时宋辽对峙，双方书禁都很严。在《读书敏求记》中谈到：圣宗时“……‘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今此本独流传于劫火洞烧之余，摩挲蠹简，灵光岿然，洵希世之珍也。”《读书敏求记》中所讲的“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的记载，证明在辽代就有关于图书发行的法令了。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历书修成，元世祖忽必烈赐名《授时历》，并定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一日，开始在全国使用新历。元朝政府在太史院专设印历局，每年印制《授时历》，颁发全国各地和友好邻邦。同时颁布法令，严禁民间私自印刷出售。由此证明，在元代也有关于图书出版的法令。

明代，朱元璋为扶持出版业发展，下令对书肆、刻坊免予征税。

## 二

以图书为媒介促进民族融合 北京是多民族相邻、杂处之地。历代不同民族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北京这个地方，就由戎族和狄族夹在当中。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幽州，这里除汉族外，已经聚集了突厥、奚、契丹、高丽、室韦、铁勒等族人民，成为当时北方诸民族交汇、融合的中心。

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北京曾是全国或北方的政治中心，除了明朝的统治者是汉人外，其他几个朝代全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辽是契丹人，金是女真人，元是蒙古人，清是满族人。为了统治占多数的汉族人民，通过出版图书，以汲取汉族的文化，就成为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巩固自己政权的手段。

辽代的契丹人，自身文化不发达，初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方由耶律庶成创造了契丹大字。契丹人羡慕汉族的文化，在南征中原时，刻意搜求文化典籍。如辽灭后晋时，就曾“取晋国图书、礼器北上”。辽代在南京（燕京，即今北京）时期，就刻印了许多儒学书籍，其中有若干经籍。全盛时期的契丹圣宗耶律隆绪，爱好汉文化，在位49年（982—1031年），曾以契丹大字亲译白居易《讽谏集》，并诏诸臣读之。契丹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年），学者萧韩家奴（字休坚）通契丹文、汉文，译《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等；还曾预修《辽实录》、《礼书》。此外，还有耶律庶成译的《方脉书》。惜以上译本均佚。辽代中期以后，契丹人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日趋繁荣。

金在中都（今北京）设立国子监，刻印书籍。天德三年（1151年）刻印、刊行了王弼、韩康伯注的《易经》，孔安国的《尚书传注》，杜预的《左传注》，孔颖达的《礼记疏》，郑玄和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唐玄宗的《孝经注》等儒家经书，用作国子监的教材。大定年间（1161—1189年），金世宗为了治理陷入危机的国家，急需借鉴汉族巩固政权的治术和经验，他提倡以汉族历代王朝的兴亡史去培养士人。为此，专门设立了“译经所”，用女直（即女真）语翻

---

辽乾亨四年（982年）九月，辽景宗死，子隆绪嗣，是为圣宗。

契丹文字分“大字”与“小字”两种。见《辽金史论集》第5辑第102页。

译并刊刻了一批经史要籍，这在《金史》中屡有记载：“自大定四年（1164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大定“五年（1165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1166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八月，金世宗“观稼于东郊。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九月，“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命颁行之。”其后，世宗在中都又令人陆续翻译了《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等，凡是金代以前汉族王朝的史书，全部囊括进来，令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在士人中广为流传。金世宗提倡科举取士，为了女真族士人应试，在大定十五年（1175年）至二十五年（1185年），曾令人译解经书，刊印出来供女真族士子应试使用。

元世祖忽必烈定鼎中原后，以大都（北京）作为统治中心，命吐蕃佛教大师八思巴新创蒙古新字（当时又称为“国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天下。其后二年，忽必烈又设置了蒙古国子学，专门命蒙、汉、色目官僚子弟入学，学习蒙古新字，并在全国各地设置“国字学”，大力加以推广。同时，又专门设置了蒙古翰林院，把各种不同文字的重要典籍翻译成蒙古新字，以便蒙古统治者学习。其中，有忽必烈命中书省平章政事赵璧用旧蒙古文翻译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色目大臣安藏用蒙文翻译的《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申鉴》等重要政治、历史著作。此后，蒙古翰林院诸臣用蒙文翻译和刊行的重要著作，还有《孝经》、《大学衍义》、《烈女传》等。这些重要典籍的翻译、出版，为蒙古统治者学习和了解汉族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指导其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元朝后期，文宗在天历二年（1329年），又设置了艺文监，用蒙文翻译儒书，使汉、蒙文化交融得到进一步加强。

明代设立了经厂，分为汉经、番经和道经三厂。由于西藏佛教在明代宫廷中颇有影响，因而藏文经书的出版受到重视。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于国子监选用监生习作。”明武宗正德皇帝（1506—1521年）就“好学番语”，“佛经梵语无所不晓”。明代先后曾翻译并出版了西藏文的大藏经——《番藏》，会同馆则编纂了《西番译语》词典等书，对汉、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起了促进作用。

清代非常重视吸收汉族文化。在入关前，于崇德四年（1639年），就曾译刻过《国语》、《四书》、《三国志》，用以“临政规范”，并使将领学习兵法与刘备、关羽、张飞的为人之道，作为道德上的学习楷模。入关后，多尔袞命满汉

文臣协同重新翻译上述数书，于顺治七年（1650年）刊行。康熙帝亲政后，下诏将《大学衍义》翻译成满文，进呈太皇太后，并颁赐诸王以下各官；同时，又赐八旗官学各一部，作为满蒙官学生必读之书。乾隆时期，政府设立了翻书房，由内府把不少经学译刻成满文图书。如：《啸亭杂录》、《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更重要的是，自清初顺治开始，至乾隆的百余年期间，译刻了《满汉合璧五经四书》，包括《翻译诗经》8卷，《翻译四书》6卷，《翻译书经》6卷，《翻译易经》4卷，《翻译礼记》30卷，《翻译春秋左传》64卷。总的来看，武英殿所刻满文本图书，包括有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军事、法律、语言、文字、天文、医学、农业等各类，共124种。其中，以《十三经》为例，几乎全部被译为满文，并刊印出来。再加上内府各部所刻、坊刻的各种满文图书，数量很多，流传至今的，虽然是一小部分，但是，据《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书目》统计，目前全国收藏的各种版本的满文图书就有1015种之多。

清代除了刊行满汉文字的书籍外，还注意出版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如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673—1708年）奉敕编纂的《清文鉴》告成。此书为满文分类辞典，共36部，280类，21卷，共收一万两千余条。后几经重修，陆续编成了《满蒙文鉴》、《三体清文鉴》（又名《满珠（族？）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四体清文鉴》。在此基础上，又编成了满、汉、蒙古、藏、维5种文字对照之《五体清文鉴》。在历书方面，有满、汉、蒙古、藏不同文字译本行世。在佛经方面，先后刊印了汉、藏、蒙古、满4种文字的《大藏经》。这些不同文种的图书，对沟通各族文化，促进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通过图书出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融合更为重视，为此，特在北京建立了民族出版社，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民族文字，出版世界经典著作；介绍汉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门类学科图书；并用汉文出版有关民族方面的学术著作和适合少数民族读者阅读的汉文图书。该社职工编制300人，其中编辑212人，高级职称58人，实力雄厚，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名列前茅。该社出版了许多不同民族文字的图书，对促进民族之间的交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三

通过图书进行中外文化交流 北京自辽以来，曾多次作为都城，既是北方或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是国际交往的枢纽，图书出版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辽道宗于咸雍八年（1072年）十二月，在高丽来贡时，赐《契丹藏》佛经一部。此外，高丽僧人沙门惠造到幽州（今北京），一次就买回《辽藏》（又名《契丹藏》）三部。又据高丽《五冠山灵通寺大觉国师碑记》记载：辽道宗曾送大觉国师“大藏及诸经疏钞六千九百余卷”。大觉国师是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他曾把从宋、辽、日本所搜集的佛教经典及疏抄编一目录，名为《新编诸宗教藏总目录》，共三卷。其中，收入辽人著作有十五人，五十部。许多作者是燕京名僧，如希麟、非浊等。《契丹藏》质量较高，高丽曾复刻。此后，复制的《契丹藏》又流传到日本，日本又据以再刊。

和《契丹藏》同时传入高丽的，还有燕京崇仁寺高僧希麟著的《续一切经音义》。后来，此书也从高丽传入日本。明、清时，这部书在我国曾一度失传，光绪年间，我国学者在日本发现了翻刻本，又从日本传回中国。

历史上的幽州，向来是我国向东方传播文化的渠道之一，朝鲜的考古发掘已获证明。《契丹藏》和《续一切经音义》的流传，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定北京为大都。随着大批色目人的迁入，中亚的医学、天文学、数学等等，也先后传到大都。来自波斯的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在至元四年（1267年）就曾向忽必烈献过《万年历》，元政府成立后，专设有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掌观象衍历。至元十年（1273年），北司天台统计其所用的回回书籍，共242部，其中都是关于天文历算、仪器制造、医学的著作。扎马鲁丁兼任的秘书监，则有二十几种回回书籍，其中的“兀忽列的四劈算法十五部”，就是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十五卷。通过图书传来的这些外来的科学知识，丰富了我国的科学遗存，打开了科学研究的眼界。

在外国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也传向外国。

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其叔到

---

见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黄时鉴著《元朝史话》第207页。